

· 性别视角下的萧红专题研究 ·

影像视域中的作家萧红

郑 薇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摘 要: 两部以东北作家萧红的人生经历为蓝本拍摄的电影《萧红》和《黄金时代》,让萧红进入大众视野,人们通过屏幕阅读她的作品,感受她的人生,体会她对爱与自由的执着追寻。萧红自觉意识的觉醒与抗争,在那个时代,也终因没有获得经济地位而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是大时代下的小女子。两部电影都对历史进行了个性化的解读,以他者视角对地域文化和人物形象进行了想象与建构。

关键词: 影像视域; 萧红; 想象与建构

中图分类号: J97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17)05-0048-04

2013年、2014年两部以东北作家萧红的人生经历为蓝本拍摄的电影《萧红》和《黄金时代》上映。以女作家为蓝本拍摄的电影在国内外并不多见,在短期内连续上映两部作品足见作家本人的影响力。的确,像萧红这样短暂而传奇的人生经历在令人唏嘘感叹之余,还会让人产生更多的好奇与疑问,而关于她的情感经历,正如《黄金时代》结尾处她自己所说的:“我在想,我写的那些东西,以后还会有人看,但我知道,我的绯闻,将会永远流传”。两部电影上映后也的确遭遇了票房与口碑、艺术虚构与对作家误读等充满争议的讨论,不管争议的结果怎样,影像中的女作家萧红已借此进入大众视野,人们通过屏幕阅读她的作品,感受她的人生,体会她对爱与自由的执着追寻。如今再看这两部电影,它们都以独特的风格在

电影史上留下值得回味的一笔。

一、觉醒与抗争——大时代下的小女子

“我离开家那年不到二十,前几年在山西遇见丁玲,她跟我一样也是逃婚出来,白薇也是,谢冰莹也是,真是一个盛产娜拉的时代”这是电影《萧红》的开篇,在香港病重的萧红对骆宾基回忆起自己的往事。成年后的萧红只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作,与一个爱的人共度人生。她不断地逃离,却又不幸地一直在时代的漩涡中,在父权社会与战火交织的乱世,将其所追求的自由变成一次次无奈的逃离,从呼兰到哈尔滨,从青岛到上海,从武汉到山西、重庆,再到香港,从异乡到异乡,直到生命消逝。像娜拉一样,出走成为其追求自由与爱的象征,然而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过,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电影中萧红借用鲁迅的话道出了

收稿日期: 2017-06-16

作者简介: 郑薇(1976—),女,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影视文化、网络文学研究。

她的困境: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者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事实上,萧红每次命运的转折几乎都跟经济的窘困有关,也几乎每次都因为钱而向社会、向男性妥协。两部电影都对她的生存困境作了详细的描述,19岁的萧红逃婚离家,为了寻找一个能资助她上学的人,与已经结婚的表哥陆哲舜来到了北平,后来因为陆哲舜遭到家里的经济封锁,没有经济来源的二人只好回到哈尔滨。此时萧红接受了未婚夫汪恩甲的帮助,影片《萧红》中有这样的镜头:萧红从北平回到哈尔滨,被未婚夫汪恩甲找上门来,与汪恩甲在饭馆吃饭,萧红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食物,狼吞虎咽地表达了她的饥饿,汪恩甲则一脸怜悯地望着她。正如萧红自己所说,尽管她并不喜欢汪恩甲,但接受他的帮助比接受别人的帮助更体面一些。可是没过多久他们就欠了旅店几百块的房钱,汪恩甲以回家要钱为名一去不返,怀孕的萧红无力支付房租,被旅馆老板关进破旧的阁楼,无路可走的她给报社写信求助。可以说,这是萧红自觉意识的觉醒:她一次次向命运抗争,一次次在父权社会遭遇困境,又一次次没有妥协地寻找出路。然而,在萧红与娜拉的时代,女性即使觉醒,也终因没有获得经济地位而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她们只能是大时代下的小女子。

萧红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抗争,在那个时代显得惊天动地,她对爱与自由的追求处处碰壁,让她遍体鳞伤,她一生中短暂的黄金时代是在日本的那段时间。因为与萧军感情出现问题,她打算投靠已经去日本的弟弟,不巧弟弟已经回国,她住在朋友的家里,在那里她暂时远离了动荡的时代,也远离了个人情感的困扰。她在给萧军的信里写道“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尽管萧红形

容自己是在笼子里,但相对于少年时的逃离与成年后的漂泊,那真是她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短暂的黄金时代。

电影《黄金时代》正是因此命名,人们期待在影片中看到一个形神兼备的萧红,想象着风姿绰约的萧红,电影呈现的不仅是萧红一个人的传记,也是那个大时代的记录,其以客观、平实、间离、多点的叙述方式讲述了时代的变迁和人物的命运。影片以萧红自述开头,导演没有采用一般电影的封闭性叙事,而是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中不断穿插有画面的旁白,采用戏剧间离的效果,让演员演着演着转身面对镜头、面向观众开始叙述那些无法用画面和情节展现的历史背景、故事情节转折的原因等等;从萧红曾经打过交道的朋友、作家、家人等视角来叙述萧红不同阶段的经历和生活,甚至还提供了对萧红、萧军恩爱仇的不同版本的解释。这让演员和观众都不断在真实与虚构、在入戏与出戏之间反复,时而被故事情节感染,时而又必须跳出故事客观地看待历史与人物。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也给观众带来了迥异的观影体验,3个小时的片长,几乎演绎了萧红短暂生命的全过程,出场的作家、文人近三十位。多点叙述方式一方面给观众提供了更多的史料与信息,让观众更加客观地作出自己的判断,但同时也由于拼盘式的叙述方式,脱离了一般观众的观影预期,需要有一定的文学以及历史知识的储备,甚至需要通过自己的想像来弥补故事情节。“这些人物被一件一事情拼凑起来,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或者那么选择,我们难以把握他们的性格逻辑和情感逻辑。多数人物显得浮光掠影,若即若离。”“萧红逃婚、送子、猜忌、分离、逃难,萧军的相濡以沫、离情别恋、毅然决然,甚至端木、骆宾基这些人物与萧红的暧昧而复杂的关系,也都就事论事,让观众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1]

尽管电影的票房收入并不理想,但史诗般对大时代与人物命运的全新呈现方式,可谓中国电影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想象与建构——他者视角下的人物形象

尽管导演和编剧最大限度地给观众提供了客观的史料,但两部电影仍然对历史进行了个人化的解读,从他者视角对地域文化和人物形象进行了想象与建构。《黄金时代》中,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立场对萧红作了介绍和解读,有时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陈诉。电影中的鲁迅被演绎成一个温柔长者的形象,全然不是人们印象中嬉笑怒骂的呐喊者。电影中,汪恩甲是穿着睡衣从旅馆离开萧红的,他在欠下房钱且萧红怀孕即将临产时为何出走,又去了哪里,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用这样一个方式离开,表明他可能是临时性的匆忙离开,也可能是故意不辞而别,电影这样呈现其离开的方式暗示了他命运的各种可能性。这是电影创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再叙事,“想象对历史的重要性表明,历史经过现在的再叙事,它的本来面目已经丧失了唯一性和确定性,历史事实以文本的方式存在”^[2]。

如果说《黄金时代》是以比较开放的态度展示了大时代中人物命运的各种可能性,那么《萧红》则融入了更多男性视角的想象与建构。“文学想象的虚构力量侵入历史,‘现在’开始有权把‘过去’纳入再阐释的视野,叙事者/作者主体的主观意识自觉进入历史、反思历史,以期获得新的意义。”^[2]电影《萧红》即对地域文化、作家形象都进行了他者的想象与建构。伊瑟尔指出“文本可以顺理成章地看作是虚构、现实与想象相互作用和彼此渗透的结果。虚构将已知的世界编码,把未知的世界变成想象之物,而由想象与现实这两者重新组合的新世界,即是呈现给读者的一片新天地。”^[3]

《萧红》给观众呈现的新天地,即是以他者视角对历史人物与商业元素融合构成的。电影上映前就引起了很多关注,这位在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由哈尔滨姑娘宋佳扮演。电影外景也大部分取自哈尔滨,这无疑也是一次展示东北地域文化、自然风情的好机会。电影还选择了3月8号妇女节的档期在哈尔滨举行了隆重的首映仪式,让萧红在她百年诞辰

之后,以光影的记忆回到故乡,可谓意义非凡。影片以诗意流畅的电影语言与多舛流离的情感为线索,再现了萧红传奇的一生。令人赞叹的是电影在视觉效果方面传达出的美感:伏尔加庄园里的俄罗斯风情、中央大街的异国建筑、落满黄叶的街道、白雪皑皑的冰雪美景、光影中定格的人像等,都呈现出了诗意而柔美的华丽,以及油画般抒情而优雅的气质。作家出身和生活的地方的风俗人情、自然景观作为故事的背景,成为参与叙事的动力。影片独具匠心的设置,使我们看到了美丽的中央大街、俄式教堂以及浪漫的雪花。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东北乡村的生活场景:萧红的父亲、母亲一边吸烟袋一边商量萧红的婚事;萧红祖父去世家里办丧事的场面中,出现了萨满跳神的镜头。但如果稍有了解我们就会知道,萧红的父亲烟酒不沾,而萨满舞是满一通古斯语族在敬神、祭祖时的仪式上跳的,也是不应该出现在汉族人的葬礼仪式上的,这些都是以他者视角对东北地域文化符号性的想象。

电影对萧红同样作了男性视角的想象,将她物化成为“美丽的作家”“每个接近她的男人都会爱上她”,成为他者眼中的女性形象。电影在绚丽的影像和诗意抒情的形式下,缺少对人物精神上的塑造,反而陷入了电影宣传海报上写的“一个女人与六个男人”的情感故事的窠臼。

电影中萧红将生下的第一个孩子送人,萧军对抱走孩子的人说“等孩子长大,告诉她,她亲妈是位美丽的作家”。结尾处端木蕻良在萧红的墓前感慨“为什么每个接近她的男人都会爱上她,哪怕她身怀六甲,贫病交加,生命垂危。”这似乎在暗示:这个作家因为美丽而令人赞叹,女人也因为被男人爱上才有存在的价值。尽管萧红的自我意识和对自我主体意识的认知,体现在她对读书、自由、爱的追求中,也体现在她对命运的选择和取舍中,她以抗争的方式实现了身体和精神的出走。但是,电影中的萧红,无论是离家去北平上学,还是被困旅馆无路可走、求助报社、给鲁迅写信,每一次遇到困境,最终都是得到男性的帮助,陆哲舜、萧军、鲁迅、端木蕻良、骆宾基等

等,男性似乎成为拯救她的唯一力量。

萧红因为经济上的困境,不断寻找依靠,这是时代的悲剧,有复杂的社会背景,但在影片中由于缺少对史实的交代,也没有相应的情节和逻辑支撑,我们只看到她不断追求新的爱情目标,而看不到她与时代和父权社会的抗争。萧红与萧军热恋时,“每天的全部内容就是为了见到他”和“等待见到他”,而当萧军移情别恋时,怀着萧军的孩子,她很快爱上了端木蕻良,电影中还暗示,在上海以及在病重期间,她还与鲁迅、骆宾基关系暧昧。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对弱势群体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他们无法表达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在这里编剧、导演乃至观众都以他者的身份展开了对萧红的想象和建构,这种想象和建构基于他们各自的利益需求而偏执一方,最终呈现了一位众说纷纭的女作家形象。那么影像中的作家萧红是真实的萧红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毫无疑问,今天的电影产业已成为资本利益下的商品,20多年前尹鸿曾感叹:“电影终于名正

言顺地成为了一种电影游戏:它消除了时间感,排除了历史意识,它也割断了与现实的真实性联系,而成为了一种自我体系、自我的封闭的游戏文本”^[4]。透过屏幕,“观众失去了自我意识和自我判断,对电影的观看已经不是一种文化行为,而仅仅是一种可以把思维关掉的娱乐行为”^[4]。这也许是类似文艺片商业化道路上的牵绊,但包括电影在内的大众文化对作家的误读,如何在影视作品中塑造作家形象,展现给观众一个值得尊重的、富有人性深度的作家的公众形象,仍然是这类题材电影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尹鸿.《黄金时代》为何遭遇票房惨败[J].中国报道,2014,(11):86.
- [2] 乔以钢.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132.
- [3] [德]伊瑟尔.虚构与想象[M].陈定家,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6.
- [4] 尹鸿.告别了普罗米修斯之后——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电影[J].当代电影,1994,(2):60-67.

Xiao Hong the Writer Revealed in the Films' Image and Horizon

ZHENG Wei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erbin 150018, China)

Abstract: The two movies - *Xiao Hong* and *Golden Age* - based on the life and experience of northeastern writer Xiao Hong's, brings her back to people's sight. Her life and works are watched in those two movies and her persistent pursuit of love and freedom is strongly felt through the screen. Xiao Hong's awaking of self-consciousness and rebellion are both in vain and she remains to be a dependent little woman of male power for the lack of independent economic status. Both movies explore grand history in the life of an individual, visualize and reconstruct local culture and characters from the other's perspective.

Key words: image and horizon; Xiao Hong; imagination and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赵莉萍)